

传

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仁政爱民”。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了传统的仁爱观，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

《说文解字》释“仁”：“亲也，从人从二。”徐铉解释说：“仁者兼爱，故从二。”这说明，“仁”不是个体的生命体验，而是一种超越个体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原则，它必须满足二人以上的共同体组织条件。段玉裁引《中庸》“仁者，人也”说，人的意思是“相人偶”，即它不是反身、自我的，而必须有一个对象，彼此互相致敬与相亲近；又引《孟子》的“仁也者，人也”及“仁，人心也”两种不同的说法，指出“仁”既是一种人类行为，又是一种心灵追求。

当然，我们对“仁”的认识，更多来源于孔子。在《论语》中，“仁”是一个标志性的高频词。孔子对“仁”的定义可谓多矣。例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sup>1</sup>“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sup>2</sup>“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1 沈元起：《白话论语读本》，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沈元起：《白话论语读本》，7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己。”<sup>1</sup>“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sup>2</sup>“巧言令色，鲜矣仁。”<sup>3</sup>……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心目中的“仁”，是言行，是心理，是礼仪，还是政治。但不论如何解说，“仁”都代表着一种克己、利他、奉公以及亲善、关怀、尊重。这正是一种良好的共同体之间人与人关系的最佳选择。“仁”的理念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了民族道德的典范和蓝本。经过孟子、荀子等儒家思想家的多方位多角度解释、补充，“仁”几乎已经获得了中华思想最佳代言者的地位，再由宋明理学家的发展拓宽，确立了“仁”作为人的思想修养和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

那么“爱”呢？依照《说文解字》，“爱”的本义是行走貌，这应该是爱慕、私相亲密的形象刻画，表达的是一种隐秘、隐藏的心理感受。后来更加上恩惠、怜宠、喜好、吝惜等多重意义。同样，这是一种面对他者的情感方式，具有与“仁”相通的共同体意义。孔子释“仁”为“爱人”，孟子的“仁政爱民”“保民而王”，又体现了儒家将“仁”和“爱”并列齐观，相提并论的人情、人性特色。仁爱二义的并驾齐驱，是民族心理和道德建设成熟的体现，也成为治国理政、和谐万姓的法宝。它是政治的、心灵的、哲学的交集公约，是文明传统的精髓所在。

我们这里谈论的仁爱，是以儒家的思想为范例。其实，中华思想是千流归海的浩荡历程，“仁爱”的思想早就是民族共识了，孔孟不过是集大成者罢了。在同时代以及更早一些的思想家、政治家那里，已经从顺应天道的角度论证了仁爱的必要性。《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sup>4</sup>，这已经将人的生命关切放在首位。人类的生命关切，必然不是自我实现的，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已从最初意义上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仁”

---

1 沈元起：《白话论语读本》，7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沈元起：《白话论语读本》，15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3 沈元起：《白话论语读本》，24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4 郭彧译注：《周易》，3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和“爱”。老子虽然有“大道废，有仁义”<sup>1</sup>的说法，但他提倡的“道”“德”与后来的“仁”“爱”是分不开的，某种意义上完全重合，反映的是先民从原始的小国寡民、分散独处到统一聚合，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过程。他的许多观察如“天之道，以有余奉不足；人之道则不然，以不足奉有余”<sup>2</sup>反映了循天道任自然的平等思想，这本身是仁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仁爱是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墨子“尚同”也是对平等思想的追求。“兼爱”“非攻”“爱无差等”，所反映的也正是对珍爱生命、返归淳朴的先民遗德的追怀。

究其实，由于中华民族自始生息繁衍在东亚大陆上，这里地大物博，天赐丰厚，我们凭借着温柔敦厚，刻苦耐劳，过着和乐丰足的生活，无事于无谓的争夺扰攘，久而久之，形成了顺应天时、凭借地利、依靠人和的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即使这种观念在后来走向大一统的民族国家过程中有所失落，诸侯纷争，列国战乱，但是基本的道德面目却未曾置换，而是转圜变易，以适应新时代的姿态，重新写进民族性格之中。儒家的超群出众，终居百家之冠，成为此后三千年国家哲学思想的源泉，正是这种继承与发展的双重性所决定的。在孔孟思想中，传统与时代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最终将仁爱定为民族道德基石。它既不同于复古的老庄一派的“返朴”、墨家的“兼爱”以及阴阳术数家的自然主义，也避免了走向法家、纵横家的铁血主义、独裁思想的危险，而是强调顺时而为，刚柔并济，中庸谐和的原则。这就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今天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仁爱思想，无疑是从儒学取法的。

任何一种成熟了的道德思想最终会演化为恒定的政治哲学。仁爱思想既然成为中华传统道德的共识，也有与之相匹配的政治格局。也正是政治实践，巩固了儒家仁爱思想的独尊地位。仁爱从个人道德上升为共同体精

---

1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4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2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18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神，对此，上古以来的政治思想都有表述。

总结上古和当世政治智慧的集大成著作《吕氏春秋》，其中有《顺民》《爱士》《上德》《爱类》等篇，都阐述了先王时贤以仁爱制胜的道理。类似的著作《淮南子》也一再强调这一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修务训》里“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sup>1</sup>，这也是仁爱二字联袂使用的初始，但所述事实是上古逸事，充分表明了仁爱原则不但是先民的社会风习，而且早就成为政治准则。这两部书分别成书于秦与汉，由两位政治家——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发起，网罗汇集了大量人士作为编纂者，可以说王权性质和民间性质俱备，所以可以确信，早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前，仁爱政治思想就已深入人心了。

儒学思想的发端以及最终胜出，在于回应时代人心的变迁和政治的崭新局面。孟子说孔子之伟大在于他是“圣之时也”，孔子也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sup>2</sup>，这里的“时”与“权”，就是思想家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给出利国利民的最佳答案。一方面，中华道德传统与民族性格扎根于这片土地，源远流长，深入人心，必须得到保护和发扬，这是一切政治和政治家作为的基础；另一方面，时代早已由小国寡民、“帝力何有于我哉”的上古时代和封侯建国的中古时代进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时代，春秋战国的纷乱和秦汉的一统就是这种时代变迁的反映。这种历史的演化其实从周代伊始就已经在进行了。孔子对三代各有所取，一视同仁。夏代中国确立了定居耕作的农业，人民质朴忠厚；殷商发展出绚烂多彩的文化，人民多才好艺；周代制定了礼制，确立了天下同风，万众归心的格局，崇尚人文精神。不过孔子并不赞成越古越好，他还是赞赏周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sup>3</sup>。这是因为周代不仅继承了前两代的优秀传统，而且突出了移风

---

1 顾迁译注：《淮南子》，26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 张燕婴译注：《论语》，13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 张燕婴译注：《论语》，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易俗、教化整合的政权作用，这为自此之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凝聚体制提供了蓝本，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进步意义。随着这种体制的深入人心和日渐巩固，仁爱这一道德律条上升为国家意志，崇尚仁爱哲学的儒学也成为意识形态的代言者。

这样说来，基本成型的儒学仁爱哲学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它是一种具有优化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关系作用的个人道德修为和行为规范；第二，它是为统一的、具有向心凝聚力的国家政治服务的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同时，为了避免这两个层面彼此分割，促进共同体的和谐完善，儒学特别强调一些基本教条，那就是孝文化的普及化以及君子阶层的培育。“孝道”对天子与百姓同样具有约束力，防止了贵族道德与平民道德的背离，同时，形成了慈孝双向运动，仁政爱民与忠君爱国同处一个层面。这样，庞大的国家和复杂的政治就有可能微缩为父慈子孝的家庭式紧凑关系。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国家政治方案。至于君子阶层，它的培养目标是进则为士，退则为民，可以居庙堂之高，也可以处江湖之远，上通下达，沟通上下阶层的关系，保全民本政治的活力，避免贵族独裁体制带来的腐朽和僵化，也避免知识阶层成为宗教教士式的精神贵族或单纯的权力附庸。同样，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权力人事制度。现实的实践状况是千差万别的。在历史的实践中，这一道德化制度化的仁爱哲学有过辉煌，也有过失败，但儒学的这种独出匠心的设计却功不可没。完全可以说，这正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仁爱哲学的基本含义从社会共同体内部人相亲近的自然主义阶段最终发展成为个人道德与国家意志相统一的文化模式，这是历史的大事件。随着夏商周三代的沿革代兴，中华民族共同体日益壮大，相对封闭的地域性的封侯建国模式再也持续不下去了。国与国的斗争也提上议事日程，武力的调度催化着强大的中央权威的诞生。在这种刺激下，中华大地开始了动荡。内部的纷争和外部的压力对民族的考验是巨大的。这是思想文化的大机遇时刻，也是大危机时刻。一时间，诸子百家蜂起，各自以自己的思

考，试图为时代开出最有效的药方。这当中，有为现实政治战争服务的兵家、法家、纵横家，也有试图恢复旧世界的道家、墨家等派别。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未尝不可取，尤其是守旧一派对中华传统仁爱的坚守，为后世所称道。然而，这两个相左的向度，却可能导致历史的断裂和共同体的破灭。如何顺应时代保持和发扬民族的初心，把平和仁爱的传统，融汇贯彻到新的政治文化中去，这在那个争霸的年代，确属难题。孔子确立了以民间道德的慈孝为基础，以贵族道德的忠敬为约束，以君子人格的信义为调节的完整的新的仁爱原则。在《论语》中，孔子对“仁”的定义貌似繁复多变，不主一执，孝、礼、勇、义、恭、宽、信、敏、惠等，可以说把诸多美好的道德和行为都赋予了仁。而这些善行美德的标准，实际上就是传统的民族性格传承和新时代新形势的需求。这样，孔子就极大丰富了仁爱的内涵，确立了统一的国家共同体每一分子的精神风格。从此，“仁”成为中华精神的名片，成为伟大人格的写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sup>1</sup>“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sup>2</sup>它成了中国人努力追求的道德境界，也浸入政治、军事甚至外交等方面的考量。

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经历了分殊异趣的种种变革，但总起来说，仁爱学说在个人的、精神的层面和国家的、行动的层面还是相得益彰地维护了其初始的大义。首先，大儒孟子和荀子都是仁爱学说的继承者。唐代韩愈评价说，“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论是弘。”“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sup>3</sup>。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所以虽然孟荀志趣有异，但对确立儒学的地位，确立“仁爱”在精神修养和行动实践两个层面并驾齐驱，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可以说，孟子更尊崇精神意识与道德修养，荀子则比较重视国家政治、军事、人事的行动

---

1 张燕婴译注：《论语》，2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 张燕婴译注：《论语》，4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3 张燕婴译注：《古文观止》，49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效果。二者都巩固发展了孔子的仁爱观念，并赋予更符合时代需求的丰富含义。孟子的思想由于后世宋明新儒学的推崇，对国民人格的塑造功能巨大，影响比较大，值得分说。而荀子的学说也绝不让其后，尤其在清末民初，以及20世纪60年代，荀子的地位声誉都得到了相当的恢复和推重，这是当时的时代，呼唤中华复兴的事功心切造成的。以仁爱思想为中心的儒学，决不仅是精神层面的，而是充满了行动力的、把国家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完善哲学。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这样成为中国人的极致追求。

孟子极大地发展了仁爱思想，尤其对中国传统政治有深远的影响。惻隐同情之心，孝悌廉耻之心，是孟子讨论仁爱的出发点。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sup>1</sup>，仁爱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政爱民，以民为本，前者突出个人品质，后者涉及政治统治原则。

从孟子的仁爱学说来看，第一他主张限制君主权力，反对暴虐独裁；第二他强调个人修养，精神追求，“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对后世的君、臣、民关系，对士人精神人格，以及对民族气质，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影响。对于中华传统来说，这种反抗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在反对压迫尤其是反抗外来侵略时表现突出。

进入大一统的汉代后，仁爱学说正式进入了国家意识形态。不过汉儒对初始儒学也有发展改造，这就是儒学史中的经学阶段。汉儒借助汉武帝促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机运，发展了儒学政治体制，将仁爱学说与君权、天意、民心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的精神基础。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天命说，提出君主应率民事天。他认为天意至仁，君主必须效法天，实行仁政。他说：“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sup>2</sup>，指出王正，则风调雨顺；反

---

1 张燕婴译注：《论语》，1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 赖炎元译注：《春秋繁露今译今注》，87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

之，则天灾人祸并至。董仲舒继承了孔子、孟子的仁爱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sup>1</sup>，强调道义至上，道德规范是“天”为“保民”而赐予人间的，人要顺天不能逆天，要接受圣人的教化而为善，坚决阻止“奸邪并出”。人的一切言行都在天的关注之下，动机不善就会受到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实，并相信任何异象都有所昭示。“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讖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sup>2</sup>如此，汉儒就将帝国政治生活与仁爱原则联系起来，创立了一种适应时代，尊重传统的儒家新统。特别是灾异讖纬说，对于中国历史政治的影响持续很久。它提醒着统治者天意不可违，而这种天意实际上又是民意的另一种表达。二者之间，必须用慈孝仁爱的方式予以连接，才具有君权神授的合法性。

宋明儒学直承孟子，特别重视修身养性，把精神境界视为仁爱之德追求的首要环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被确定为最主要的经典。值得注意的是，宋明儒学的仁爱观增加了物我一体、人我合一的物性统一论，这与这段时间里中国历史经历过佛教、道教与儒学的交锋、融汇后形成的三教合一的局面有关。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人权平等意识的觉醒，民胞物与，人人可为尧舜的志趣盛行，古老的仁爱学说，已不仅仅是道德高尚的士君子操守和国家政治的专利，而成为普通大众的口头禅、座右铭。同时，佛教的讲究慈悲，怜贫惜弱，道家的崇尚自然，清静无为，都成为仁爱的当然内容。哲学家们以无极到太极，气到肉身，从肉身到道德的完整图式，论证了仁爱的必要和必然。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普及教育，又将仁爱的旨趣推向新的高峰。

到了明清时代，由于理学的传播，礼不下庶人的戒律打破了，“天理”成了中国人的口头禅，“仁义”成了大众性的人物标识。这些都是仁爱哲学的进化和新成果。当然，必须意识到，物极必反，道德标准的一致性和

---

1 赖炎元译注：《春秋繁露今译今注》，243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

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董仲舒传》，190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普遍下放，也意味着道德责任的过重负担。道德普泛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全民向善的移风易俗，也助长了道德伪善的泛滥和帝国抵抗力的下降。所以宋明理学也颇遭诟病，并在后来经受了更大的批判。究其实，过度重视仁爱原则在精神层面的巩固加强，追求道德性格的圆满，而忽略了其灵活变异的政治效用，特别是抵御外侮、抵制外来文化侵蚀的能力减弱，是儒学发展至宋明理学、心学所不可忽视的缺憾。仁爱不是自我束缚的道德绳索，而应该是民族自信心和力量的源泉。宋明理学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仁爱传统在帝国疆域甚至异邦、他民族地区的普及推广，也造成了教条僵化的一些后果。这也是后世穷则思变的来由。特别是到了晚清和民国时代，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遇的历史大变局，改良和改革的呼声就无足为奇了。但是这种改良或改革，并没有消弭仁爱作为我们民族灵魂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其预期效果和目的，正是恢复民族精神元气，达成仁爱政治的初始意义。总之，仁爱作为中华传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历史中除名和缺席。

仁爱哲学是古老的中华传统，象征着共同体组织之间人与人的淳朴和乐，其形成有着适应中华民族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活方式的天然合理性。后来，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儒学归纳裁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它具有两个层面，即个人道德与国家意志的双重性。这在孝、忠恕、推己及人等教条中得以体现。同时，它也有两个向度，即精神性的和实践性的。思想性方面无疑是克己修身，教育教化。实践性方面，则是爱国、忠君、亲民、扶危济困等。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仁爱思想

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基本上都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展开的。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自身方面看，经过了清代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国的社会状况渐渐地走向停滞和国疲民弱。自清中叶以来，农民起义不断，白莲教、哥老会、天地会都是公开或隐藏的反政府组织。

而在外部，西欧在结束了一千年的黑暗中世纪以后，展现了充足的活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明水平不断提高，借着航海大发现的机遇，开始了全球贸易和殖民活动。世界市场的概念形成了，文化的传播也开始了最早的全球化过程。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再按原来的固有模式生活下去了，而是必须自愿或被迫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融入这个最早的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去。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老大帝国”的中华文明感受尤其深重。一方面，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延绵数千年而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模式上基本保持一贯的文明，要彻头彻尾地改造体制、变革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新的机遇和压力，又迫使它不得不做出回应，做出改变。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分析了中国人为探索救国的道路而经历的艰苦旅程：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sup>1</sup>

---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69~1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仁人志士的种种努力，无非出于拯民于水火的愿望。自晚清以来，中国的仁政传统已经遭到破坏，各种势力轮番登台，包括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权，都不免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各地军阀割据称霸，忙于争权夺利的混战，政府政令不出于都门，仁政爱民成为空谈，人民生活无法改善。卖子救穷，同室操戈，民不聊生，苟全性命于乱世，慈爱孝敬的文化，渐渐被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所湮没。无论从个人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国家政治层面，传统的仁爱原则都岌岌可危，徒具形式。这当然与儒学的困境有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是中华仁爱思想传统的集大成者，如今由于宋明理学以来的渐趋僵化，变成了迂阔、颟顸、麻木、守旧的代名词，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这完全是时势所造就的。这一局面，固然与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冲击有关，但在全球思想激荡融合，相互交流的大背景下，这一过程势不可当；而采纳新思想、新文化的同时，还要拒绝全面西化，拒斥帝国主义，保持民族独立完整，这是无法逃避的强大民族心理的必然结果。

在此时，谁能重建中华传统的仁爱政治，一统天下，为民做主，休养生息，建立符合时代潮流和民族需求的新制度，采纳先进的西方科技，建设强大安定的国家，谁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在这一方面，历史做出了鲜明的回答。大浪淘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可以说适逢其时，是历史最终的选择。正如毛泽东所说：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

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sup>1</sup>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先进分子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所面临的问题。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不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浴血奋战，推翻了头顶的三座大山，成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尽管新中国是在汲取世界上的先进经验尤其是西方思想的最新、最进步成果——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新型的制度却与中国人民的传统情感分不开。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便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这是对古老仁爱传统的政治生态的确认和改良。可以说，传统仁爱原则在宋明理学的长期实践中出现了变质的状况，不再能发挥中国人民那种生机勃勃、团结一致、高度凝聚的精神面貌，而是变成统治权术，孔子已经成为腐朽的统治阶层借以维护旧体制的幌子。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的《原君》，直承先秦儒学和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对君主的独裁和暴虐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示出宋明理学的盲目忠君思想对中国人性格的负面影响，呼唤中国政治重新回到真正的仁政爱民轨道上来。清末民初的有识之士章炳麟、康有为、谭嗣同等对清朝的腐朽统治予以抨击，以古代尤其是中古三代和先秦的奋发有为、真情仁爱为参照，号召建立新型的大同世界。最后，由改良到革命，五四运动风云激荡，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文化先锋的崛起。

---

<sup>1</sup>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就必须把仁政爱民的传统和对西方先进思想和科技的接受结合起来，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初，这个任务就明确了。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成熟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历史使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是重要的文献。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这里回顾了历史上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以仁爱政治形成的“平等的联合”；而近代以来，“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这些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sup>1</sup>。一句话，拯民于水火，取得民族独立，赋予人民自由

---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安宁平等的生活，是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和前进的动力。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这种人民性与国家统治结合在一起，他说：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sup>1</sup>

共产党人不但在理论上以人民为本，还把这种仁政爱民思想具体落实到实践中去，谱写了仁爱思想的新篇章。在共产党历史中，这种亲民爱民的实践可以说一直是党的建设的核心。即使在长期的为取得政权进行的严酷武装斗争中，这种人民性也贯彻始终。井冈山时期制定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禁止军阀作风，严防军队扰民，取得了军爱民民拥军的世界奇迹，军队真正成为人民子弟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称名副其实，军队甚至成为道德的模范，荣耀的所归，这都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

中国共产党既然代表人民的意志而建立以人民为本的国家，对党员的要求就必然具有严格的标准。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就结合历史和现实说明了共产党员应具备的素质。他把共产党员的标准同历史上的儒学君子的作用结合起来：“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有的修养。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

---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同广大劳动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同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党派建立革命联盟，领导广大劳动群众和一切同盟者同自己一道前进；必须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一切革命阶级的利益，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也就是说要代表占本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就是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并且要了解这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阶级利益。”<sup>1</sup>

可以说，由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确立的共产党员的修养标准，正是在历史传统的爱国、亲民、克己奉公、忠诚无私的基础上，采纳当时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综合而成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传统理想得到了真正的实践，国家对人民爱护关切，人民也衷心拥护。

### 第三节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五十年的“冷战”，铁幕拉开，东西方世界，尤其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呈现出和解、和平的气象。中国共产党本着与时俱进的一贯作风，积极充当时代的领跑者，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脉搏，把人民大众的愿望和心声化为己任，开始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历程。早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代领导人就已基本解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历史难题，释放出了强烈的转型和转向信号，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可谓先声夺人，为之后的变革树立了良好示范，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更是以无往不胜的勇气和信心，排除干扰，奋发图强，坚定不移地走向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道路，历经四十年努力，中华大地的面貌焕然

---

1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一新，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党领导人民谱写了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雄壮进行曲。在这样一支慷慨恢宏的乐曲当中，凝聚了几代领导人的心血，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所代表的正是共产党所继承的传统文化中精髓所在的强国富民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以及民胞物与的大同思想。没有这样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是不可能取得国家面貌的极大改观和社会的均衡发展的；这个均衡发展尤其是人的发展，也就是说，先富带动后富，兼顾个人和集体，人人平等、幸福、安乐、和谐的社会氛围，是几代领导人持续追求的目标。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出现种种失衡的现象，但基本都得到了及时纠正，每当面临改革前路出现新问题、新思维的时刻，人民利益就成为衡量得失的准绳。客观地说，我国经济、政治、军事没有出现大的、剧烈的波动，没有造成大的危机，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条人民为主、人民为先的共识存在于党内，扎根于社会。无疑，以人民为本，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建设国家的法宝，只要这一根本法则没有丢失，国家的局面一定是蒸蒸日上，日新又新。其实在历史上，能做到这一点的执政者，也都国运昌隆，功德垂远。这是古典的政治智慧，也是人类共同的政治财富。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传统的必然继承人和世界先进文化的积极接受者，在这方面所拥有的优势，毋庸赘言。

如今，在这一切既有的基础之上，我们又迈进了即将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也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时刻。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饱受屈辱，在列强环伺的高压环境下苦苦求索生存和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领导人民改观了旧中国无以为继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但是前进的道路之曲折，也超出我们的想象，充满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争论和纠葛。党在何去何从的道路艰苦抉择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如果我们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出发去认识这个特色的内在含义，那么可以说，它就是在采纳现代化的西方文

明优秀成果的同时，也没有丢弃传统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这样的结合，是中国能够崛起的前提。前人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在新的时期，需要我们用更美好更有信心的蓝图去补足完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百年大计、伟大复兴的高度，用国际的视野，务实的态度，为我们指明了新的征程。

大国复兴需要伟大思想的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治国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成为统一全民共识、凝聚中华民族奋进力量的强大思想武器。其中中国梦思想的提出，最为引人注目，可谓恰逢其时。中国梦的理念，蕴含着共同富裕、平等和谐、国家富强的含义，与传统儒家思想的仁政爱民底蕴一脉相承，正是因为这一点，它迅速赢得各界认同、赞誉和人民的衷心拥护。习近平明确指出，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和继承，他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sup>1</sup>从习近平的讲话来看，他提到的这些古代的名人名言都出自忧国忧民、主张施行仁政、爱民保民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青史留名的忠臣良相等人物，其中洋溢着深厚的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精神。与他在讲话中对党员干部和人民大众的道德情操的期许，更是一脉相承，不谋而合。

习近平还指出：“中华民族具有 5000 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

---

1 习近平：《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 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13 年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 日，第 1 版。

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 56 个民族、13 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sup>1</sup>可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团结人民共同奋斗视为当前实现复兴大业的基石，这一基石根植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共同信念。

中国梦既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诺亚方舟，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强盛的归家之路。因此，在加快加大发展科技、贸易，充实国力，接轨发达国家的同时，对中国的贫困及扶贫问题，党中央自最高领导到基层干部，各级工作人员一直给予极大关注，投入极大人力物力财力，广泛动员，全面出动，为解决部分地区人民的贫困状况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习近平在闽东调查时就特别关注贫困问题，认为与发达地区相比，贫困地区好比一只“弱鸟”，并提出了“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等扶贫思想<sup>2</sup>。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使命和每一个中国人联系起来，针对脱贫攻坚，动脑筋，想办法，有计划，有步骤，有决心，有信心，这种坚定，不能不说是古往今来优秀的古典文明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传统的同根相系和发扬光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最为引人瞩目的举措是反腐肃贪。习近平指出：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反对“四风”，反腐倡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一时间，力度空前的“反腐风暴”横扫全国，从部级到处级，

---

1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18 日，第 1 版。

2 习近平：《摆脱贫困》，2 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

从科长到村长，从党政机关到科研院所，反腐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从节日禁令到衣食住行，再到公车改革，各类新规相继出台，形成合力；从大的纪律原则，到迟到早退、服务态度这样小的工作细节，全党作风快速转变，良好的政治生态快速形成。习近平的铁腕反腐赢得了中国老百姓的心。反腐表面上是对个人堕落分子的清除，实际上是对人民利益的极端维护。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一时间，全党上下形成了“有腐必反”，决不“养虎为患”的气候。如何在国家日益富强，国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思想多元复杂的后现代境遇中保持初心，继续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建党初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出了一个完满的答案。

倡廉肃贪与改革发展并行不悖。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公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又一个具有战略眼光和非凡意义的布局和壮举。“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外交，更是内政，它极大地拓展了国家和民族的交往交流空间，为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持久而影响深远的活力、动力，是传统的中华仁政的天下为公，怀远招来，慈爱惠及四海，共荣共存胸襟气度的再现。它符合中国人的气质和精神，是日渐强大起来的国家和人民的自豪自爱、推己及人的品格在世界舞台上的最大出彩。因此，“一带一路”受到国际社会各个国家的空前欢迎，也鼓舞了国人的奋斗精神，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一带一路”是祖先创造，后人再造，继承发展的典范，凸显了党和国家对历史的继承，对人民的责任，是在对国际风云气候的正确判断下，对大国气度，大国权益，大国担当的全面思考和体认，它为亿万民众开拓了发展前进的新道路，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大工程。

2017年新春伊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提出的愿景是，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

为达此目的，《意见》要求：把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丰富拓展校园文化，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抓好传统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实施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中华文化资源公共数据平台。”“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鼓励发展对外文化贸易，让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推进国际汉学交流和中外智库合作，加强中国出版物国际推广与传播，扶持汉学家和海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通过华侨华人、文化体育名人、各方面出境人员，依托我国驻外机构、中资企业、与我友好合作机构和世界各地的中餐馆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

传统文化的再兴，不再是口号、形式，而是符合人民愿望，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大势所趋的时代共识。传统文化的仁政政治，孝亲慈爱，互帮